

袁世凯 孙中山加入洪门

袁世凯元年 11月 11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党。孙中山抵达檀香山之后，鉴于保皇会势力很盛，为图挽回人心，每日到各埠发表演说，宣传革命思想，使革命声势重新振奋。孙中山母舅杨文纳认为孙中山初次游美，成绩不佳，实在是因为缺乏同志相助，力劝孙中山加入洪门会，以增强革命的阵容。并且告诉孙中山说：“现时保皇党机关林立於美洲各埠，倘不与洪门人士合作，势难与之抗衡。”孙中山听后，觉得母舅说得很对，于是请洪门前辈钟水养向洪门致公堂介绍入闾。

致公堂职员中有身跨保皇籍者，对孙中山加盟一事表示异议，钟水养对他们说：“洪门宗旨，在于反清复明，孙某未入洪门，已实行洪门宗旨多年，此等人应招纳之不暇，何以拒之门外？”反对者没有话说。致公堂于是选择这一天为孙中山特别开台戏（按：洪门称拜盟曰演戏），同时，拜盟者 200余人。由主盟某大佬，封孙中山为“洪棍”。洪门职员按例分洪棍、纸扇、草鞋三级，洪棍即元帅之别名。之所以封孙中山为“洪棍”，是因为孙中山领导革命，声誉远播海内外，所以崇以最高尊称。

孙中山加入洪门后，革命势力在檀香山迅速发展，给保皇会以沉重打击。

袁世凯孙中山反击保皇党

在进行“立党”和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同时，孙中山十分重视革命报刊的宣传工作。1895年至1896年那几年，他以很大的力量帮助留日学生创办刊物，在香港筹办兴中会的第一个机关报《中国日报》，支持《世界公益报》等报的出版，开始建立起第一批革命的舆论阵地。1896年，当他第四次来到檀香山，并以此为出发点，作环球旅行，在南洋、美洲一带进行革命宣传组织活动的时候，又以很大的力量支持当地华侨革命报刊的出版，使这一带的革命派的报刊宣传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当时，孙中山所面临的是保皇党人的疯狂挑战。1896年10月，当他自安南经暹罗，到达檀香山的时候，首先碰到的就是当地保皇党报刊的恶毒攻击。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等人以南洋、美洲一带为避难场所，在这一带建立了大量的保皇会组织，发展会员，使保皇派的势力遍及于海外的百七十余埠，会众以数十万计。他们一方面到处招摇撞骗，诈骗华侨商人的钱财，作为保皇活动的经费；一方面又与帝国主义殖民当局和华侨中的右翼保守势力相勾结。创办了一批报刊，进行保皇立宪的鼓吹，蒙蔽欺骗了相当一部分华侨群众：“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

在檀香山，由于受梁启超“保皇即革命”和“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等欺骗性口号的蒙蔽，不少兴中会会员已改投于保皇党麾下，檀香山各岛的保皇会支会发展到八个，而兴中会的会务则完全陷于停顿。当地保皇会所办的《新中国报》大放厥辞，风行

一时,成为造谣惑众的反革命讲坛和革命形势发展的严重障碍。

为了反击保皇党报刊的猖狂进攻,揭露它们的反革命嘴脸,使受蒙蔽的群众觉醒过来,孙中山抵达檀香山不久,就联系程蔚南、郑金、李昌等兴中会会员,把程蔚南在当地开办的《隆记报》更名《檀山新报》,改组为兴中会在檀香山的机关报刊,并亲自撰写评论,和《新中国报》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了《驳保皇党报》、《警告同乡书》等两篇著名评论文章,亲自揭开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保皇两派报刊大规模论战的序幕。

在这两篇著名的评论文章中,孙中山着重地批判了《新中国报》的以下的一些观点:

第一,所谓“爱国”的观点。《新中国报》打出“爱国”的旗子,在“团结御侮”的幌子下,要求人民“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企图以此消灭革命,维护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孙中山的文章对此作了揭露,指出它所爱的国,其实只是媚外残民的“大清国”,而不是中国人民的“中华国”。如果爱的是“中华国”,就“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政策”。否则,“非爱国,实害国也。”

第二,所谓“瓜分”的观点。《新中国报》危言耸听地鼓吹什么“中国之瓜分在于旦夕”,扬言革命将引起动乱,加速中国的“瓜分”,对革命人民进行恫吓。孙中山的文章驳斥说:不对!列强之所以要瓜分中国,是因为“政府不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只要人民“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举而推翻“残腐将死”的满清政府,“则列国将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

第三,所谓“过渡”的观点。《新中国报》在理屈词穷之余,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由革命而建立共和政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固始终不能免于革命”,但又强调要有一个君主立宪的时代作为“过渡”,即所谓“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成立立宪民主”,企图用庸俗进化论的观点来遏止和滞缓革命的发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展。孙中山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只要是世间“行之已收大效”的事,我们都可以立即取而效法它,无须消极地等待“过渡”。他举新式火车在中国的使用为例驳斥说:“若照彼之意,则中国今日为火车萌芽之时代,当用英美数十年前之旧物,然后渐渐更换新物,至最终之结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车,方合进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人间有如是之愚乎?”

此外,孙中山的这两篇文章,还揭露了《新中国报》、《新民丛报》和它们的主持人梁启超、陈继俨等人所谓“借保皇之名,行革命之实”的宣传骗术。指出他们都是“康趋亦趋,康步亦步”的保皇派死党,其所以打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旗号,“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其主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目的完全是为了蒙蔽群众,“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撕破了他们的画皮,揭穿了他们首鼠两端的骗人手法。

孙中山的这两篇文章,在革命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孙中山已经彻底放弃了联合康梁共同反清的任何打算,斩钉截铁地和他们划清界限,成为一个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这两篇文章也帮助檀香山和南洋一带的华侨群众,从保皇党的蛊惑人心的欺骗宣传中觉醒过来,耳目为之一新。“前之误受康党诱骗者,纷纷脱党复党,而新会员加盟者亦络绎不绝”。原来已经瘫痪了的兴中会组织,得以复兴,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还没有系统,他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也还没有最后完成,这一场论战只能就事论事地进行辩难,还没有可能对保皇党的一系列反革命观点作全面的系统的批判。此外,在反对清朝政府的问题上,过分强调了满汉种族的界限,模糊了阶级界限,在对待帝国主义“瓜分!”的

问题上,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却幻想后者能够“钦我敬我”,自动放弃侵略,这些都影响了批判的力量,不可能对保皇党的那些反革命论点作出彻底的反击,这些都是和孙中山本身思想的局限性分不开的。

在檀香山进行的这场论战,是1919年开始的革命派报刊和保皇党报刊进行的那场大规模论战的一次大的前哨战,是对保皇党报刊前此的反革命宣传的有力回击。孙中山十分重视这次论战,1919年11月,他在写给当时在上海的前中国教育会和国学社的负责人之一黄宗仰的信中,就专门向他谈起这件事情,说:“弟刻在檀岛与保皇党大战……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他不仅挥笔上阵,投入这场战斗,并且号召上海、香港、日本等地的革命党人利用一切宣传手段,“遥作声援”,“竭力打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使人人知所适从”。为了使革命派在檀香山的这个宣传阵地能够坚持下去,他还特意从香港《中国日报》调一些得力的骨干到《檀山新报》担任主笔,充实后者的阵容,以便把这场论战进行到底。

猿瑶历史最长的妇女报刊

属于革命派的妇女报刊当中,言论较激烈,影响较大的是《女子世界》、《中国女报》和《福州女报》。

《女子世界》从 1903 年 1 月创刊,到 1905 年停刊,断断续续地出版了十八期,是辛亥革命时期历史最长的一家妇女报刊。它初创时,由我任主编,第二年第六期起,改由陈志群(以益)任主编。丁是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的会员,陈和当时在上海的同盟会员有密切来往,和秋瑾也保持有密切联系,都是思想比较激进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他们的主持下,这个刊物在它的社说、演讲、传记、译林、文苑等栏中,刊出了《女子家庭革命说》、《争约之警告》、《女魂篇》、《女界革命》、《女权说》、《女雄谈屑》、《为民族流血无名之女杰传》、《革命妇人》、《革命与女权》、《哀女界》等大量文辞激烈的政论和文学作品,积极鼓吹“政治之革命”和“家庭之革命”并举;号召妇女们,居家的拒买美货,在美厂做工的“快快一起同盟罢工”,投入正在激烈展开的反美拒约斗争;号召妇女们以苏菲亚等外国的女中豪杰为榜样,和男子一道,“携手以上二十世纪之舞台,而演驱逐异族光复河山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之活剧”,和“独夫民贼”及“异族走狗”作坚决斗争,表现了强烈的革命倾向。对“束缚驰骛二千年之久”的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法、学说、风俗、社会宗教”,也进行了初步的批判。成为《中国女报》创刊以前的一个时期当中,宣传最持久,言

原年的故事

论最勇猛,反映最强烈的一家革命妇女报纸。秋瑾对这个报纸十分欣赏,曾经写信给它的编者,推之为妇女报刊中的“巨擘”,表示“不胜心服”给它的工作以很高的评价。

二十
世纪
百年
故事

源瑶锡良创办川汉铁路公司

袁慰园年 苑月 愿日 ,四川总督锡良奏请创办川汉铁路公司。奏称 :四川物产殷富 ,只是由于转动困难 ,百货不能畅通。外人久已垂涎揽办川路 ,我应及早筹办铁路 ,由官设公司 ,招集华股 ,自保利权。拟仿京张铁路章程 ,由川省设立川汉铁路公司 ,先尽华股招集试办 ,并延访工师 ,会同委员确切果勘 ,分别支干各路 ,照章修筑。

袁慰园年 员月 ,经奏准后 ,锡良在成都岳府街设立了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不久 ,英国公使照会清外交部 ,提出该路所需的外资 ,应在英、美两国借用。法国驻重庆领事也照会川督 ,谋求承办路款和路工。对此 ,该公司都以“一切均系自办 ,尚无须借助于人”而加以拒绝。

初时 ,锡良委署藩司冯煦为川汉铁路公司督办 ,继委成绵龙茂道沈秉堃为会办 ,以后又委派新任藩司许涵度为督办。袁慰园年 员月 ,锡良改派建昌道现任永宁道赵尔丰为督办。袁慰园年 赵尔丰离省 ,公司督办职再由沈秉堃代理。公司的督办皆由总督委派 ,财政则隶于藩司 ,一切事务均以官厅的命令来进行。

川汉铁路工程浩大 ,需巨额经费 ,集资十分不易。该路预定路线自汉口起 ,经宜昌、夔州、重庆、永川、内江、资阳以达成都。计路长 源四百里 ,耗资 缘四万两以上。至 袁慰园年 员月 ,公司仍无力集资 ,难以动工 ,有名无实。

这时 ,在东京的四川留日学生上书锡良 ,要求将该公司改为官商合办 ,并提出集股办法。

袁园年 圆月 锡良奏定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 规定集股有认购之股、抽股之股、官本之股和公利之股等方法。

通过抽租入股等强制性措施,该公司集资成效显著。至袁园年,公司实收股银总计 员愿万余两,其中购股 远万余两、官股 猿万余两、租股 员猿万余两、土药股 圆园万余两、盐茶股 缘万余两。租股占总额的 愿豫以上,而购股仅占约 猿豫。

袁园年 缘月,长寿县举人张罗澄等奏称:“此路宜正名民办。”京官王荃善等人也公呈商部称:路事“不如民款民办,为势较顺”。

锡良为调和官绅意见,于 苑月奏称:川汉铁路的筹办应该“多用土绅”,公司“则以尽除官习,昭示民信为先”,“官民各股,即应官绅合办”。他派沈秉堃代理官总办,在籍翰林胡峻为绅总办,乔树柟为驻京总办。

该公司由官办改为官绅合办以后,实权仍握在以锡良为首的官僚集团手中,凡清廷公司律股东应享受的权利,川民丝毫不能过问,引起当地绅民的强烈不满。

此时,四川绅民要求商办铁路的呼声日渐高涨。川省留日学生蒲殿俊约集 猿园余人组成川汉铁路改进会,上书锡良,请求川路公司实行商办。

袁园年 猿月 源日,锡良再次奏请将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振乔树柟为公司总理,胡峻为副总理。

同时,拟订了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的“续订章程”。其中规定:自成都经重庆万县,以至湖北宜昌的路线让归川修。共需股本约银 缘园园万两以上,先集资 员园园万两。在成都设总公司,于宜昌设分局,另于北京、上海、汉口及川省各州县酌情设“招股处”。招股分为股分之股和抽股之股,以 缘园两为整股,缘两为零股。公司设董事 员猿人,查账 猿人,“董事限有本公司股份一百整股以上,查账亦限于五十整股以上之股东之到会选举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之”。先聘请本国人担任总工程师。购料,包工等实行投标法。公司的盈余分作二十成计,“以一成报效公家,二成作为公积,三成作为在事人员之劳金,十四成作为股东红息,按股分派”。

以上条款反映出广大绅商力求按照商律,自主办好该公司的意愿。但是,仍有一些条款反映出公司对官府的依赖。如规定:“至重大事件,仍禀总督办理”,“呈请四川总督奏派总副理二人”;“租股征收之法,由本公司呈请总督札饬地方官会同本公司绅董,遵照租股专章办理”。该公司并未完全实现商办。

1905年11月,清政府邮传部奏请援照湖南粤汉铁路公司设立三名总理的成案,改派胡峻为驻川总理(1906年胡病故,由曾培继任),费道纯为驻宜总理,乔树柟为驻京总理,并以三总理名义在成都设立总公司。然而,公司开业后并无起色。

1906年11月,四川省咨议局通过“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提出筹济股本、修订章程、清查账项和整理财政等整顿办法。

同月,该公司在成都召开第一次股东会,力争进一步摆脱官府的束缚,以获得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不久,公司成立了董事局,选举萧湘、江树、汪世荣等12人为董事,由刘紫骥任主席董事,郭成书等12人为查账员。

至同年底,公司总计集股银1500万余两。同时,加紧筹备开工筑路。该公司特聘詹天佑为总工程师,颜德庆为副总工程师,他们先后到宜昌,亲赴工段,勘定路线,制定计划,在宜昌设立工程局。12月18日,川汉铁路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宜昌至归州175余里间“同时兴作,徒夫万千,是为川路开工建筑之始”。

宜昌至万县段铁路开工后,“工事绝难,若隧洞、若桥梁、若斜坡、若弯线皆国内它线所未有”。驻宜总理乔树柟知难而退,继任总理李稷勋也“彷徨却顾,窃窃以为大忧”。

1907年11月,公司召开第二届股东会,选举产生了新的董

事会 推彭兰村、都永和为正副主席董事。会上 股东对路线问题发生分歧 争吵不休。由于股东会。意见不统一 严重影响了筑路工程的进展。至辛亥革命时 宜万段铁路仅修成 猿园余里。

与此同时 川路公司总收支、上海办事处保款委员施典章挪用路款 投机牟利 被上海几家钱庄倒骗公司股款银 员园万两以上。施还利用职权 与洋行买办陈逸卿勾结 侵蚀股款银 近园万两以上。此外 他购买兰格志股票 又被骗去路款银 愿缘万余两。结果将川路公司存沪路款银 猿园万两的大部分损失 致使公司更难以维持 陷入“款悬路危”的困境。

缘巴尔的摩大火灾

1904年10月2日至10日发生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大火是美国历史上破坏最严重的第二大火灾。大火烧掉了150公顷的商业区,烧毁房屋1000座,损失达1000万美元。但出人意外的是,在这次大火中只死了一个消防队员,竟还是被倒塌的墙压死的。

巴尔的摩大火是1904年10月2日上午10时在约翰·赫斯特及其公司的布匹绸缎批发仓库里燃烧起来的。最初的情况对于消防灭火是很有利的。街上已禁止车辆行驶,所有的消防水栓都处于工作状态,而且路上没有积雪妨碍消防车开到现场。不料后来刮起了大风,待消防队赶来开始扑灭赫斯特仓库烧起的大火时,大风已越刮越猛,并将火苗刮过弯曲狭窄的街道,烧着了其他建筑物。不巧的是,该商业区的大多数房屋是老式的木制结构,燃烧起来就像是大绒箱一样。在被烧毁的1000座房屋中,算得上新式建筑的不到100座。

一位评论家在《评论之评论》杂志(1904年10月)上发表文章指责消防部门说:“那次大火,要是有一位称职的大队长指挥一支装备精良的消防队,是不会扩大的,可是它扩大了,而且是迅速地蔓延开来。”

当时在现场消防队队长是称职的,但是他到达现场后几分钟就被一条断落的电线击昏,失去了指挥的消防队人员只好各行其事。他们没有组成防火线的密集的水墙来阻止火势蔓延,而是几个人一组,分头用水去救各个不同的点,结果收效不大。

有些队员见压不住火势,便泄气不干了。

当局调来一支部队用绳索和铁丝将 1.5 公顷的区域围圈起来。巴尔的摩市当时的 1/3 个居民中,大多数都聚集到这里来观看大火烧毁商人的俱乐部、股票交易大楼、第一国家银行(当这家银行在熊熊燃烧的时候,许多穷苦市民幸灾乐祸地欢呼起来)。有影响的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办公大楼是美国修建的第一座钢筋结构楼房,这时也陷入了一片火海。在两个小时内,这座大楼就只剩下四根柱子立在地面上了。

尽管这座大楼已被烧毁,但在它倒塌之前,《太阳报》还设法出了一期号外。为了弥补这次火灾所造成的损失,这期号外每份卖 1 美分,而不是像平时那样卖 5 美分。市里还有另外两家报社,在报道火灾的消息方面不甘落后,也出版了号外,每份也卖 1 美分。当时的情景甚为罕见,成千上万的人站在火灾现场警戒线外面,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关于这场火灾的报道,不时紧张地从报纸上抬起头来,看那熊熊烈火正在把一个城市的商业区化为灰烬。

街上到处都是火。经过持续 10 小时与烈火搏斗,消防队员逐渐累垮了。一位消防队小队长将一名不知危险睡在火场旁边的消防队员唤醒,问他:“你睡了多久啦?”

“不知道。”那位消防队员迷迷糊糊地说,“我真的不记得了……睡了很久了……有三天了。”

消防队员们拖着沉重的双脚,回消防站去治疗烫伤和刮伤,然后又回到火场跟火搏斗。

被电线击昏的消防队长约登在消防站救醒过来后,马上站起来,立即跟聚集在周围的记者谈话:“我最初是打算撞开赫斯特特仓库大门,以便将一条水龙带送到楼里。我刚用肩膀顶住门,就有人叫喊着有危险,并跑过来救我,就在那一瞬间,响起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火苗顿时窜出楼房的屋顶,并迅速蔓延到毗邻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的楼房。”

大火蔓延到一个巨大的煤渣堆上，拳头大小的煤块被烧得爆飞到空中，然后散落在成千上万的观火者身上。许多男人和妇女对此显然早有准备，他们撑开伞，来防避这场罕见的火雨。

列克辛顿街、卡尔沃特街和圣堡罗街所有高大的商店楼房都被烧掉，火势迅速向码头方向蔓延。尽管从费城运来了 100 多件救火设备和一批消防人员，又从 100 英里以外的纽约运来 100 多名消防队员，但仍无法阻止火势蔓延。

在码头上，大火烧毁了牡蛎行业的包装工厂和仓库，烧掉了成千上万捆烟叶（当时全国已缺货几个月），木材公司也被烧毁了。

1 小时后，大风突然停息，大火才慢慢熄灭了。

辽东在中立国上进行的战争

日俄战争,是以中国为主要战场进行的一场日本和沙俄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侵略权益的帝国主义战争,也是一场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侵华战争。

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由来已久,尤以甲午战后和庚子沙俄侵华为甚。《辛丑条约》签订后,沙俄侵略军依然盘踞在中国东北,不肯撤走,妄图变中国东北为“黄俄罗斯”,这不仅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也引起了其他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奉行卖国政策,中俄关于交付东三省的交涉,逐渐被日、俄之间的分赃谈判所代替。

日本和沙俄的谈判,从1904年1月13日,在彼得堡开始。当时沙俄的打算是,在朝鲜问题上对日本作些让步,以换取日本政府在东北三省问题上对它的支持或默认,但是日本在英美两国的支持下,采取强硬态度,只承认沙俄“在满洲铁道企业方面的特殊利益,还要以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势利益,以及同意各国在东北三省的“工商利益均沾原则”为交换条件。1月15日,沙俄侵略军再次占领奉天省城,软禁奉天将军增祺,与此同时,俄军还在旅顺、瑯春、辽阳及其他一些战略要地,修筑工事,打算永久占领中国东北。日俄谈判虽然还继续进行,但毫无进展,两国态度皆趋强硬,谈判陷于僵局。日俄谈判的症结是:双方都怀有对中国东北和朝鲜的野心,日本反对沙俄完全控制中国东北,沙俄也不甘坐视日本独占朝鲜。

当时,沙俄对整个形势及日俄双方军事力量和国际形势作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了错误估计,认为“现在日本无论在陆海军或财源方面,都不可能同俄国竞争到底”。实际上,日本各方面的准备要比沙俄充分得多,而且得到了英、美的大力支持,而沙俄则内部政治经济方面皆困难重重,国际上的支持也极其有限。

1904年圆月远日,日本宣布断绝与沙俄的外交关系,并且作好了战争部署。圆月愿日,沙皇政府在给阿历克塞也夫的电令中说:如果日本的海军“越过了朝鲜西海岸的第猿度纬线,不论是否登陆,你都要不等他们动手,就斟酌情形袭击他们”。可是,没等俄军动手,战争就爆发了。就在沙皇给阿历克塞也夫下令的当天夜里,日本海军对停泊在旅顺口的沙俄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沙俄舰队遭到重创。圆月员日,日、俄两国分别下天皇诏书和沙皇诏书相互宣战。

在英美两国政治、经济的大力支持下,日本在战场上节节胜利。

1904年缘月员日,日本陆军渡过鸭绿江,占领九连城,取得日俄陆战第一次胜利。缘月圆日,日军第二军攻陷金州。远月员日,日军第二军的第四师团与俄军在得利寺激战,大败沙俄劲旅。愿月下旬,日本以第一、二、四三军从东北、西北、正北三个方向逼近由沙俄远东军司令库罗巴特金驻守的辽阳。怨月源日,经过猿天苦战,日军攻陷辽阳,取得辽东大会战的胜利,俄军主力退守沈阳。10月,库罗巴特金在奉天南部沙河一线,集结 10万兵力,向日军发动猛烈反击,以死伤 1万 1千人的惨痛代价,才勉强取得暂时的相持局面,俄军被动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改观。

在海路方面,1904年缘月猿日,日军实施第三次沉舰,封锁旅顺口取得成功,吃水较深的军舰不能自由出入。愿月员日,双方舰队在蔚山相遇,发生激烈的争夺战。结果俄军海参崴舰队损失四艘军舰。从此以后不敢复出,日本海军得以纵横海上,取得控海权。

1905年11月1日,困守在旅顺口的俄军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在要塞司令特塞尔率领下,俄军将校愿愿名,士卒愿愿人向日军乃木希典将军投降,旅顺要塞落入日军之手。猿月初,日俄陆军在奉天进行大规模会战,结果,俄军溃败,奉天省城、铁岭相继为日军占有,沙俄陆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缘月圆日,从波罗的海远道赶来的沙俄舰队,在对马海峡遭日本海军大将东分所率舰队的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至此,俄军一蹶不振,被迫对日妥协。

1905年怨月缘日,沙俄大臣会议主席维持以日方所提条款为主要内容,与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缔结《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争夺中国和朝鲜的帝国主义战争,以沙俄失败而告终。日本得以独占朝鲜,并从俄国手里取得库页岛南部、辽东半岛租借地、南满铁路。这样,在中国东北,沙俄失去独霸一方的优势,形成日、俄对峙、分据南北为“势力范围”的局面。

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打起来,迫于双方的压力,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然放弃了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职责,于1905年圆月圆日宣告局外中立,听任日俄强盗屠戮中国人民,毁夺中国人民的家园。在一年多的战争时期里,东北许多地区居民的身家性命、财产房舍、田园庄稼,不是毁于炮火,就是遭受日俄双方军队的烧杀、抢劫。鏖战最激烈的奉天,赤地千里,一片荒凉,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死于兵灾,更多的人被迫逃离家园,流落异地他乡。可以说,日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并不亚于任何一场侵华战争。

日俄战争改变了列强在远东的格局,战后,由于俄国的削弱和日本的强大,使日美矛盾日益突出,日俄矛盾趋于缓和。同时,这场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俄国的革命,有力地推动了亚洲人民的觉醒。